

# 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千万不能伤

朱隽

近期部分地区的粮食收购市场似乎正被一种观望情绪所笼罩。据媒体报道,日前黑龙江等粮食主产区由于粮食价格出现下跌,农民惜售,企业惜收,购销双方的观望令收购进度明显缓慢。粮价的波动,让原本指望增产之后再迎增收的农民有些失望。业内人士担忧粮价不稳会影响农民的种粮积极性,进而影响到明年的粮食生产。

这种担忧不无道理。因为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对于保证粮食产量、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起着重要作用。一旦农民失去了种粮的热情,即便是农业投入增加、科技到位、基础设施改善,我

们面对的仍可能会是土地抛荒、粮食减产。

近年来,为了提高农民的种粮积极性,国家出台了一系列强农惠农政策:全面取消农业税、建立对种粮农民的补贴制度、逐年提高最低收购价格、启动临时收储……政策与市场等因素相互叠加,不仅使我国的粮食生产走出了“两丰一平一减”的周期循环,实现连续8年增产,也使粮食价格稳中有升,农民收入大幅增加,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得到有效提升。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粮食生产可以高枕无忧了,“三农”发展依然有“软肋”,农民的种粮积极性还有可能被削弱,粮食生产

出现波动的风险依然存在。

应当看到,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,我国的农产品供需仍将处于一种紧平衡状态,农业资源的约束以及环境保护的压力比以前更大,粮食产量稳定在1万亿斤以上仍然面临巨大压力。而且,人口的增加、城市化率的提高、消费水平的不断提升,这些都迫切要求粮食产量和质量实现稳中有升。

尽管近年来农民种粮积极性比前几年有所提高,但农资价格的不断上涨“侵蚀”着种粮效益,务农增收比不上外出打工,而且农产品内部比价不合理,种粮比不上种植经济作物等

差距,又在严重削弱着农民种粮的热情。如果粮价出现波动下滑,在种粮收益普遍不高的情况下肯定会影响到农民对土地的投入。

保证农民的种粮积极性,首要的是保证他们的收入。只有种地有效益,收入能增加,农民才能够更有积极性。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说,我们在整个农业生产的推进当中,增粮和增收要统筹考虑。在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的同时,要坚持强农惠农富农的政策不变,并保证各项政策措施落实到位。还要调控好市场,保证农产品能卖出合理的价格,让农民实现增产增收。(据《人民日报》)

## 立法严惩诬告好人,彰显社会正义力量

张西流

12月17日,广东省委宣传部副部长、省文明办主任顾作义在全国第二届好人论坛上透露,广东正在修订完善省人大提请的见义勇为保护条例,诬告见义勇为者将被追究法律责任。(12月18日《南方日报》)

时下,救人反被讹诈的尴尬事件时有发生,严重挫伤了人们见义勇为的积极性。小悦悦被车碾压,18位路人无人施救,便是一个惨痛的例证。我们呼唤道德的回归,但我们更需要对道德进行有效的保护。广东修订完善见义勇为保护条例,拟规定诬告见义勇为者将被追究法律责任,并授予见义勇为者重奖,支持和保护见义勇为,有利于彰显正义力量。

救人反被讹诈事件的发生并非偶然,从一个侧面折射出现代社会的道德困境。一个社会要形成稳定的道德秩序,创造良好的社会风尚,不仅要有强有力的社会舆论监督,而且要求每个社会成员的“良知”自律。然而,当被救助者丧失了诚信和良知,还理直气壮地去伤害行善者时,受伤的行善者却个个显得孤立无援,处在被动挨打的位置,为自卫请自劳心费力。这时候,行善者是多么需要正义力量挺身而出。

而在此前,对于被救助者的反义之举,有关部门似乎也是束手无策,要么提醒见义勇为也要“留一手”;要么建议“救人要留证据”,要么在救与被救之间进行“和稀泥”式的调解;即便是

不奇怪,就是比一般人更加“敬业”。我们总是说“干一行爱一行”,大多却是“这山望着那山高”,没有多少人能够做到“贼敬业”。我近来常想:管校车的入如果能够像袁宝洪那样,不管校车安全不安全,我都要认真检查,看它到底安全不安全,确实安全了,心里才舒服,你说校车能出那么多事故吗?负责侦破盗窃案的警察倘若也有袁宝洪那种劲头,能让他一个人干500多起盗窃案还查不出来吗?

“学习的敌人是自己的满足,要认真学习一点东西,必要从不自满开始。对自己‘学而不厌’,对人家‘诲人不倦’,我们应取这种态度。”我从小就会背诵这段话毛主席语录,快退休了才刚刚有点明白其中的道理。袁宝洪这样的“贼人”很值得研究,从事犯罪学的专家们可以从多方面研究,其他人则可以从“贼敬业”方面找一找自己“贼不敬业”的差距。(据《北京晚报》)

## 不可或缺的平凡良心

冯雪梅

夏鹃,一个12岁的小姑娘,在小巷日凌晨突发大火时,挨家拍门救下15位邻居;刘玉珍,一位75岁的老太太,每天在天安门广场义务捡垃圾;王伟力,建起一家盲人电影院,给盲人讲述电影里的故事,看着他们流泪、欢笑……

让人有所触动,不是名目繁多的年度人物评选,而是普通人的温情故事。

路人的冷漠,让抱起小悦悦的拾荒者愈发显得质朴友善。十几年悉心呵护、喂饭植物人丈夫;父亲瘫痪母亲出走,用幼小的肩膀撑起了一个家……这些平凡的好人,琐碎的善举,真实的、可以触摸的温暖与关爱,更有打动人心的力量。

可能,那仅仅是出于本能,源自真诚善良的伸手相助;或者,将一次次次的举子之劳、悲悯关爱聚集起来,最终成就美德和崇高,它们看似很简单,缺少英雄壮举中的非同寻常、惊天动地,但也恰恰最接近生活的本质,贴近人性的真与善。

这就是那些平凡的良心。看似平淡无奇,却孕育着社会的基本秩序、美好、良善。

我们的社会,其实不缺高蹈的主义或者行而上的道德,缺少的是最为基本的良心和底线。前者,可以说是追求者的崇高境界,我们总以为它高于人的好尚,殊不知当它高到一定程度,让人无法触及时,就是圣贤守则。因为对普通人不适用,这种“崇高”也就失去了约束力,非常人之力所能及。其结果,就等于没了标准,人们只把它当“高调”

## “天下无贼”的梦想不靠孤胆英雄

郝洪

因在公交车上“提醒”被窃者当心扒手,上海保安张荣生下车后遭遇3名小偷报复,被殴打至昏迷。近日,一条热转的微博将低调的见义勇为者推至前台。让人欣慰的是,消息一出,许多人向张荣生送上敬意,上海警方也迅速就此事展开调查,缉拿行凶窃贼。

提醒被窃者、勇抓窃贼,张荣生做这样的事不是第一次,在偷盗作业集团化、规模化趋势下,民间反扒者每一次见义勇为,都要冒极大的风险。而最大的凶险还不是遭遇报复,而是得不到社会的响应,成为孤胆英雄。

去年,大连民间反扒队——猎鹰反扒队联盟创始人、反扒英雄魏磊在东莞被窃匪刺死。而他之所以从大连远远东莞,是因为2009年在抓小偷时,不慎将两名小偷打伤,遭遇公诉;惠州民间反扒者“铅笔”在抓获偷车贼时,被小偷割伤双手6根肌腱,东莞警方多方奔走,为他申请“见义勇为基金”,结果却不了了之;蚌埠市民陈宝国路见不平,追赶抢夺一女子项链的窃贼被打,却不见围观路人施以援手。

缺乏法律保障、社会认同,许多一度令窃贼胆寒的民间反扒队伍纷纷沉寂。对于这些民间反扒者,有一些地方尝试收编、整合的方式,使之成为一支专业反扒队。这其实是有些这些见义勇为者的本意,专业反扒固然重要,社会安全还需要每个人积极的自守。这些见义勇为者存在的意义并不在于他们是否正规、专业,而在于他们的正义

感、责任心及勇气,能够帮助营造一个支持见义勇为、驱邪扶正的社会风尚。即使,我们不可能抓住所有坏人,但总要做到让坏人怕好人,总不能让好人怕坏人。

我们需要保护这样的正义感、责任心,除了对见义勇为者要及时表彰,建立见义勇为奖金,还需要专业队伍的保驾护航。在社会安全环境营造上,民间义士本来就是配角,他们不可能承担起社会安全保障的主要责任,在地方政府、公安、司法机关都认真履职,民间见义勇为日渐成为社会风尚的地区,社会安全指数才可能有大幅提高。

近日,就在张荣生见义勇为微博新闻热播之时,还有一条不大为人所注意到新闻很有意义。报道说,在上海宝山刘行地区警方为当地居民细心地绘制了一张“防盗地图”,上面用图示标明了刘行派出所辖区内的盗窃案高发点,并写上“去霜泉菜场当心盗窃案高发”等细致的提示。自从有了这份地图,该区域两轮车街面失窃案件下降了40%至50%。一些长期在宝山一带流窜的窃贼也承认,居民看了地图后警惕性高了,得手次数与以前相比明显少了许多。

对张荣生而言,这份地图的意义或许更大于见义勇为基金的奖励,“天下无贼”的梦想之下,他们不是一个人在战斗。(据《新民晚报》)

## 从“贼敬业”说到“贼不敬业”

苏文洋

选择在法院、检察院等司法机关、事业单位门口,我认为这对我来说是一种刺激,我要看看公安机关的侦破手段到底有多高。抓着我算我倒霉,抓不到我,我就抄上了。”一位老公安20多年前曾经对我说,“是猫就避鼠。”这是倒装句,意思是鼠回避猫,不管是什么样的猫。我深以为然。现在看来,《黑猫警长》里面老鼠们唱的“老鼠怕猫,那是谣传”歌谣,还是有生活依据的。现实生活中,袁宝洪这样的“贼鼠”公安侦破手段的精神需求。他主动坦白的500多起盗窃案,等于于是他给警方出了500多张“试卷”,警方一律交了“白卷”。

第二个“特别”是他的“贼敬业”。袁宝洪说:“一开始是为了钱了,破获”了数百起陈年积案,也让本市法院有了成立至今最厚的判决书:长达345页,字数达16万多。

袁宝洪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“贼”。在我国北方,“贼”这个词至少有两种含义,一是专指从事盗窃,二是达到某种程度、境界,“贼贵”、“贼贱”、“生活贼美好”……不是说“贼”有多好或不好,而是“特别”的意思。袁宝洪就是一个“特别”的贼。

第一个“特别”是他的“贼大胆”。他说:“我们偷走一辆车大概用四五分钟,时间长了我存有这样一种心理,就是出于一种挑衅。比如我有很多次盗窃都是

## “国企董事长家遭劫”不能止于八卦

陈方

曾专门到省纪委接受询问谈话。事实上,在“小偷反家”并不鲜见的背景下,如果白家遭劫金额果真是5000万,公众都大抵见惯不怪了。这只不过又增加了一个“小偷与贪官”的谈资罢了,剩下的“故事”只能交给纪检监察部门续写。故事的结局到底被写成什么样,公众不能也不该有太多话语权。

一则已被告破的遭劫案,公众很难明白,遭劫的金额为何会成为“机密”而不能公之于众?5000万的传言如果是谣言,

说法四处弥漫,山西警方对此采取了“不辟谣”,亦“不接受采访”的沉默态度。

警方的沉默不免让坊间浮想联翩。民间常常流传贪官“有四大怕”:一怕记者曝光,二怕小偷偷盗窃,三怕情人举报,四怕同盟背叛。国企董事长家中遭窃,是不是应了其中“一怕”还不好定论,但可以肯定的是,“小偷偷出贪官”的版本,10年前就开始上演了。可以印证白家谎报遭劫金额的一个信息是,据新闻披露,此劫案发生后,白培中

曾专门到省纪委接受询问谈话。事实上,在“小偷反家”并不鲜见的背景下,如果白家遭劫金额果真是5000万,公众都大抵见惯不怪了。这只不过又增加了一个“小偷与贪官”的谈资罢了,剩下的“故事”只能交给纪检监察部门续写。故事的结局到底被写成什么样,公众不能也不该有太多话语权。

一则已被告破的遭劫案,公众很难明白,遭劫的金额为何会成为“机密”而不能公之于众?5000万的传言如果是谣言,

说法四处弥漫,山西警方对此采取了“不辟谣”,亦“不接受采访”的沉默态度。

警方的沉默不免让坊间浮想联翩。民间常常流传贪官“有四大怕”:一怕记者曝光,二怕小偷偷盗窃,三怕情人举报,四怕同盟背叛。国企董事长家中遭窃,是不是应了其中“一怕”还不好定论,但可以肯定的是,“小偷偷出贪官”的版本,10年前就开始上演了。可以印证白家谎报遭劫金额的一个信息是,据新闻披露,此劫案发生后,白培中

曾专门到省纪委接受询问谈话。事实上,在“小偷反家”并不鲜见的背景下,如果白家遭劫金额果真是5000万,公众都大抵见惯不怪了。这只不过又增加了一个“小偷与贪官”的谈资罢了,剩下的“故事”只能交给纪检监察部门续写。故事的结局到底被写成什么样,公众不能也不该有太多话语权。

一则已被告破的遭劫案,公众很难明白,遭劫的金额为何会成为“机密”而不能公之于众?5000万的传言如果是谣言,

## “良心人物”：需要仰望的道德群像

苑广阔

12月17日,“2011平凡的良心”颁奖典礼在北京大学百年纪念馆举行。面对被车两次碾轧、18位路人漠然无视的2岁女童小悦悦,挺身而出的拾荒阿姨陈贤妹获“良心人物”奖。除此之外,还有另外9人获奖。(12月18日《新京报》)

陈贤妹、刘玉珍、石清华、王振明、王伟力……这一连串或熟悉或陌生的名字背后,是一个又一个或让人感动、或引人深思、或带来感叹的事迹。虽然身份不同、所处社会阶层不同、所做的事情也不同,但是他们身上却有一个共同的标签,那就是“良心人物”。

所有获奖者都不是名人明星,都没有光环笼罩,他们就是如你我一样的普通人,但是良知和道德却让“他们”从“我们”当中脱颖而出,成为这个时代的道德榜样,成为这个社会的道德楷模。

仔细看看这一个一个名字背后的事迹,不管是在“小悦悦事件”中挺身而出的陈贤妹,还是在天安门广场义务捡垃圾数十年的刘玉珍,抑或是照顾108个孩子的“白菜爸爸”石清华,他们的所作所为,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,也没有可歌可泣的功绩,却秉持着最朴素、最本真的善意和良知,坚守着做人的底线。

恰恰是这种善意和良知,恰恰是这种做人的底线,“我们”中的大多数却没有做到。否则,在“小悦悦事件”中,为什么18个路人漠然走过?为什么很多人是天安门广场的垃圾制造者,却只有刘玉珍老人是垃圾清理者?所以说,“良心人物”成为这个时代需要仰望的道德群像,而真正需要从中做出反思和改进的,正是我们这些旁观者。

我们需要做的,一是真诚向这些“良心人物”致敬,表达发自内心的敬意和赞扬;二是盘点和反思自己的不足之处,见贤思齐,“激活”自己心底的道德和良知,并且用来指导我们的言行。(据《济南日报》)

## 知识不等于智慧

乔新生

陕西农民老韩辛辛苦苦把自己的孩子培养成大学生,可是没想到,孩子毕业之后找不到正式工作,只能和自己一起打工。这是2011年12月14日《中国青年报》刊登的报道。作为一个大学教师,看到这样的报道深感愧疚。中国大学教育是失败的,这不是在进行价值判断,而是在陈述一个残酷事实。

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呢?现在的大学只教给学生知识,却无法提高学生的智慧。因此,那些拿到文凭的大学毕业生,未必拥有生存的智慧,他们白白地浪费自己的青春,却一无所得。

过去人们常说知识就是力量,知识改变人们的命运。现在看来未必。互联网时代,知识俯拾皆是。拥有知识的人,并不一定拥有智慧。许多有知识的人,并不能被称之为知识分子,因为他们不具有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。多数不过从一个教室转到另一个教室,获得一些毫无关联的信息。

笔者始终认为,大学教育应该是哲学教育,是关于生命的洗礼,是关于社会的分析。大学的存在是为了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,培养学生自我生存发展和与人相处的能力。相对于生命而言,智慧恰恰就是一种生存的能力;相对于生活而言,智慧就是一种处理人际关系的能力;相对于工作而言,智慧就是一种应变的能力。然而现在的大学已经混淆了知识与智慧的区别。我早就呼吁,在中国的大学教育制度没有改革之前,不要把上大学看作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,因为大学教育的投入产出不成比例。

一些大学校长认为大学毕业生杀猪、卖菜都很正常,这实际上已经在暗示,不要把上大学看作是一种正确的投资。既然在现实生活中可以学到杀猪的本领,那么还不如提前进入社会通过实践获得杀猪的智慧;既然大学毕业之后只能在菜市场工作,那么还不如直接进入菜市场,早日实现自己的原始积累。

读书能改变人们的精神,却不能改变人们的财富;读书能改变人们对待生活的态度,却不能改变人们的命运。有的人可以通过读书提高自己的智慧,有的人则只剩下毫无生命的知识。我觉得,若是为了纯粹获取知识,不如去上网。只要掌握基本技巧,完全可以通过自学获得充足的信息。所以,砸锅卖铁也要把孩子送进大学的心态,应当一去不复返才好。(据《武汉晚报》)